

# 乡村演出回顾与思考

焉健夫

“拉大锯，扯大锯，姥姥村里唱大戏。拖他姑，搬他姨，娃娃也要跟着去……”

听到这支不知诞生于何年何月何时何地，但传播极广流传至今的质朴的民谣，有过乡村生活经验的人们一定感到既熟悉又亲切，而大连京剧院那些年岁稍长的演员们，更是对走村串屯的乡村演出有着刻骨铭心的记忆。

大连京剧院六十年来下乡演出可分为两大时期，以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农村电视普及为分水岭。前期可称为兴盛期，后期可分为萧条期和复苏期。前期也可分为三个阶段，一是从建国初至1964年“社会主义教育运动”及1965年东北大区文艺会演为多以演出传统戏的商业演出阶段，二是从“社教”后至“文革”结束，基本是无偿服务的政治配合性宣传演出阶段，演出内容多为现代戏和小型多样的各类节目。三是文革后恢复传统戏的又一商业演出阶段。

在那个年代，城里剧团到农村不论是商业性有偿演出，还是纯服务性无偿演出，也不管是传统戏，现代戏，还是各类小型多样的政治宣传类综艺节目，几乎每次演出都非常火爆。在这种背景下，下乡演出在大连京剧院的全年演出日程中一直占有很大的比重。一些还健在的退休老演员回忆起当年的情景，总是感慨万端。那时候的演出条件非常艰苦。那时，乡间多是土路，甚至很多村屯不通公路。要自带行李，自带伙房，坐敞棚卡车。在大一点的县镇演出后，再往下边的村屯走，行李道具往往要人挑肩扛马车拉。有几年还兴“挑担下乡”，每个演员都挑着一付担子，一头是行李，一头是服装道具，一天走几十里路然后就演出。

在那个时代，尽管条件十分艰苦，演出也没有什么演出费之类的补助，但剧团的所有演员对下乡为农民演出积极性都非常高，每当有下乡演出任务，不管岁数大小，也不管是主要演员，还是一般角色，也不论平时对剧团有什么看法有什么意见，到这时全都主动要求下乡，像曹艺斌、周少楼、张铁华、刘慧琴、闻占萍、赵鹏声这些著名演员都是下乡的主力，他们演出时是主演，演出结束后，也像一般演员一样装车卸台，然后同样打开自己带的行李，睡在教室或老家。夏季蚊虫叮咬，隆冬寒气贬骨，有时因天太冷，女演员贴的片子都冻结在两鬓，即便这样也没有人叫苦，没有人退缩。

十年文革期间，许多老演员受到冲击，剧团处于不正常状态，但在这种情况下，出于“改造思想”和政治宣传的需要，被视为“笔杆子”一部分的文艺界下乡演出也很频繁。剧团五十多岁以上的老演员记忆最深刻的是1972年现代京剧《龙江颂》。

那一年辽南地区大旱，市里为配合农村抗旱，安排当时名为样板戏学习班《龙江颂》剧组赴辽南四县一区，要求进行不漏每一个公社的全覆盖式演出。一辆从工学院借调的大客车，两辆卡车，五十多天，行程上千里，转遍辽南的山山水水，演出六十多场。于春荣，陈梅英两个“江水英”的扮演者，尽管演出任务很重，但每当谢完幕连妆都不谢就跟着大家一起卸台装车。在新金县的俭汤公社演出场地与观众隔着一道小河，乐队演奏时脚浸在河水中。“样板戏”要求不

走样，舞台要求标准比较高，不少公社现搭舞台，马槽子当底架，上面铺上各式各样木板，由于厚薄不一翻跟头时弹力不一样，腾空后扭扭歪歪很难控制，有人竟翻出舞台，落到观众群中。武戏演员王彦春在翻“串九毛”时，与另一演员头与头相撞，造成额骨与鼻梁塌陷……盛夏的乡村夜晚，聚光灯下蚊蛾如雾般纷纷扬扬，直往舞台上演员的脸上身上扑，有的竟钻入演员的口中耳中……

“四人帮”粉碎后，结束了十年间十亿人看八个样板戏的文化专制，人们禁锢多年的精神得到释放传统戏一度热了起来。剧团也恢复了辽南农村的商业性演出。

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，电视在农村渐渐普及，轻音乐及歌舞乐节目盛行，仅大连地区一年内就有四十多家外地歌舞团来连演出，京剧滑入低谷，农村的商业性演出也失去了市场，无偿性演出也限于经费困难基本停止。给演员们留下印象的是1992年，市里为了丰富农村文化生活，安排京剧院分成两个演出队，带着由杨赤主演的《铡美案》、丁艳玉主演的《金玉奴》、李萍主演的《女杀四门》分赴庄河、瓦房店、普兰店北三县演出，除此外十多年来辽南地区乡村再难听到城里剧团的铿锵锣鼓声……

2006年，大连市财政对剧团采取了下乡演出财政补贴政策，这一有力的措施极大地调动了剧团和演员们的积极性，每年送戏下乡成为制度性常态，“姥姥村里”又开始鼓起了锣鼓，唱起了“大戏”，京剧艺术辽南地区乡村演出又逐渐复苏……然而，送戏下乡这一文化惠民工程实施五年来，尽管剧团热情很高，乡村公路网四通八达，现代化的大型流动舞台车随时可抵达县区的各个村镇，这种无偿的演出却遇到了一些尴尬：在大多数演出热闹火爆的同时，也出现了部分乡镇出现的不愿接，勉强接，观众不够踊跃，演出场面现场较为冷清的现象。出现这种问题的原因有以下几点：一是宣传不到位。80年代以前，农村都有广播站，“小喇叭”通到家家户户，村镇干部在广播站一吆喝，十里八村每家每户都知道剧团要来演出的消息。现在尽管通讯发达，几乎家家户户都有电话，但“小喇叭”没了。村镇干部很难做到挨家挨户打电话通知。二是农村的各级政权权威性、号召力减弱。改革开放前，农村的政权组织是公社、大队、小队三级，集体劳动，集体活动是常态，村镇干部的权威和号召力比现在相对比较强。如今是单干，各家顾各家，村民们对干部的话可听可不听，村镇安排的这类文化活动可去可不去。三是组织不到位。如今人们重视抓经济，某些乡镇政府机构对群众的文化需求摆不上位置，连组织宣传这类事都嫌“麻烦”。这些年的实践证明，凡是乡镇政府和基层文化干部热心的地方，观众就踊跃，演出效果就好。凡是当地干部嫌麻烦的地方，观众就冷落，少数村镇许多村民直到锣鼓敲起来才知道有剧团来演出。距演出地点较远点的村庄，甚至一无所知。

送戏下乡，丰富农村文化生活，满足农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，是广大文艺工作者的一项重要任务。如何贴近生活，贴近群众，贴近时代，需要我们不断总结经验，不断探索，与时俱进，把这一文化惠民工程越办越好。